

邓晓芒◎著

徜徉在思想的密林里

思想的密林里，有冷峻的岩石，也有激情欢快的溪水；有扎根厚土，
直插时代天空的壮硕树干，也有依偎大地，缠绕于生命根系的丛丛藤
蔓。这满纸密密交错的光影，是思想者彷徨在林中路上的深深浅浅的印
迹。路还在脚下宛转盘曲。思想的密林没有边界。我们各行其路，却
在同一林中。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徜徉在思想的密林里/邓晓芒著. —重庆:重庆
大学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624-6792-2

I. ①徜… II. ①邓…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22385 号

徜徉在思想的密林里

ChangYang Zai SiXiang De MiLin Li

邓晓芒 著

责任编辑:李金正 版式设计:上海六点文化

责任校对:贾梅 责任印制: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 88617183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90 × 1240 1/32 印张:10.5 字数:301 千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24-6792-2 定价:28.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再版序

本书的再版,正在我近 50 年的老朋友刘培沛因患肺癌刚刚去世时。刘培沛在本书中我的自传体长文《一个“右派崽子”的“革命”经历》中是一个重要人物,他与我初中同学,一起下乡插队,一起在农村参加“文革”和回城办知青小报,一起献身于小农场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同生死共患难。最近三十多年,我到武汉读书、教书,他在长沙办厂谋生,走的道不同,但心是相通的。我时常想,像他那样一个具有非凡谋略和杀伐决断能力的人才,搁在某一个适当的时期,是能够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来的;但不幸的是,他的这些才能只好在“文革”这一场毫无意义的“浩劫”中消磨掉了。当然,这种消磨并不是没有任何收获的,尤其是在我们那个漫长的青春时代。从 16 岁下乡算起,直到 10 年后返城,我们一直都处于一种“半自立”的状态,无法过上稳定的自食其力的生活;但我们作为一个时代青年的思想却在那 10 年中突飞猛进,我们置身于城乡之间,官民之间,“革命造反派”和“黑五类”之间;从头至尾经历了整个大动乱的疯狂的过程,真如领袖当年所号召的,在大风大浪里经风雨、见世面。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根性,也识破了我们从来信以为真的那些教条的虚伪和险恶,我们凭借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进行了一场自我启蒙。这一整个过程,我都是和刘培沛一起走过来的,我们一起经历了生存的磨难和底层的艰辛,理想的破灭和信念的重塑,虽然他的长处在行动,我的优点是思考,但我们是互相影响的。

也许在一个外人或者今天的小青年看来,我和刘培沛这种人就像史前时代的恐龙,至今还保持着理想主义的人生哲学和行为准则。有人甚至把我们称之为“老愤青”,说我们因为受到过“文革”的刺激,三句话不离“文革”,如同祥林嫂。这样看的往往是一些“文革”以后才出生的小孩,他们可能以为自己是天上掉下来的。以自己的麻木和无知来嘲笑别人的执著,这种劣根性不知

道是从哪里学来的。“文革”不仅是我个人的一段宝贵经历,而且是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反思素材,时至今日,给全民族带来如此巨大灾难的“文革”不仅没有得到彻底的反思,而且被一些人有意遗忘了,甚至无形之中还有死灰复燃的迹象。中国老百姓的不满大都是怀旧的不满,是“好了疮疤忘了痛”的不满,所以中国历史只能在不断循环中原地踏步。对“文革”的思考恰好可以有助于理解这一点。“文革”的全民狂热和弱智化无以复加,即使是那些深受其害的人也都被卷入其中,除了极个别的(如张志新等),每个人都生怕自己被这场排山倒海的运动落下,被落下的也只剩下一门心思,就是什么时候能够重新“归队”,被运动所接纳。而这种心态有一个共同的思想根源,就是认为人总是必须在某个皇帝或代表人民的领袖那里找回自己的主心骨,否则就失去了生活的意义。这种思维方式正是中国几千年的皇权专制主义所传下来的。

前不久,有朋友问我中国人今天需要什么样的信仰,我的回答是:中国人需要的并不是信仰,而是权威。为什么中国社会今天道德沦丧?并不是没有信仰造成的(因为中国人从来缺少真正的信仰,但并不是一直都道德沦丧),而是没有权威造成的。中国人讲道德的时候通常都是相信有一个“天理”的时候,这也许可以称之为“信仰”;但天理如何能够让人相信?是因为有“天子”,一个活生生的天的代表,他能够用自己的强权证明天理的存在。因此,只有当“天子”和“王法”存在时,中国人才相信有天理;而一旦相信了天理,中国人就有一整套的道德规范和道德约束,如礼义廉耻,忠孝仁爱,这个社会就有了“道德底线”。在某些士大夫那里,似乎觉得这套规范甚至还可以凌驾于具体的天子之上,成为对天子本人的约束(所谓“从道不从君”),其实不过是一种书生傻气和错觉罢了。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道德最为和谐的时代(所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都是皇权最为巩固的时代,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至今人们所称颂的 20 世纪 50 年代的道德风气,虽然没有了皇权的背景,但也是有个绝对权威的背景的;虽然没有了“天道”的迷信,但取而代之的是“人民”崇拜。

然而,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连这样的权威也都已经不存在了。领导任期制的推行使得任何个人都来不及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任期一满就得交权,这就使传统的天理天道失去了具体的支撑,腐败的瘟疫开始从掌握一定权

力者那里蔓延开来。在中国,没有了信得过的权威来体现的天道天理,就成了无人相信的空谈,与此相应的就是道德根据的丧失。当然,对当代中国社会体制来说,这毕竟是一种进步,我们今天不可能再设想一个由打天下而坐江山的皇帝来供我们崇拜了。但与此相应的,就是建立在这种皇权权威之上的天道天理的没落,以及由天道天理所支撑的传统道德的失效。今天那些极力宣扬用传统儒家道德来拯救世道人心的人,几乎谁都没有认真地想过,他们所要实现的目标只有通过重新树立一个皇帝的权威才有可能,而这种皇权复辟的梦想,哪怕是变相的或者山寨版的,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就是说,要让中国人仍然按照过去 3 000 年生活过来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已经不可能了。

有人也许会说,现在只要大力恢复家庭私德,推崇孝道,就有可能改变社会风气,而不一定需要效忠于一个绝对权威或皇帝。他们认为儒家伦理的“外王”恐怕无法继承了,但“内圣”总还是可以保留的,而且只要内圣在,是可以开出“新外王”的,这种论调在今天非常流行。但实际上,持这种观点的人对儒家伦理的内在结构并没有清楚的认识。他们不知道,通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从家庭私德推广到社会公德有一个条件,就是整个社会有一种大家认可的更高权力来协调各个家庭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有权威的“父母官”和皇帝。否则的话,家庭或家族之间就会各为其家,亲亲互隐,亲亲相护,永远处于相互冲突中,怎么可能将人之老幼视同己之老幼?这就是近年来不断发生的受救助者对于救助者的反诬事件背后的社会心理背景。南京彭宇案的法官所提出来的“常理”是:“如果你不是肇事者,为什么去救她?”也就是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原则上是不可能的。佛山小悦悦案则突显了更深一层的社会心理,这就是“路人”原则:凡是“人之幼”而非“吾幼”,一概不予“及”之。在这两个案子里面,家庭亲情的私德都并没有受到触动,不能由此得出中国人失去了道德底线的结论,中国人失去的只是公德。试想如果救助的对象是自己的亲人或沾亲带故的人(“吾老”“吾幼”),这些悲剧都不会发生。那么今天我们大力弘扬儒家孝道,对改变这种现象有什么帮助呢?对自己家人好就一定会对“路人”好吗?当然,如果这个路人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家人”,即一个更大的“家庭”中人,例如一个“国家”中的“阶级兄弟”(如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事件,曾被载入中学语文课本),那又另当别

论,但前提是必须有一个绝对权威充当这个大家庭的“家长”。

反过来说,当社会公德败坏、世风日下时,家庭私德也好不到哪里去。一个对“路人”的苦难视若无睹、缺乏仁心的人,对自己家人的温情也必然是功利的,自私的。今天的家长从小就教育孩子在人前不要“吃亏”,对他人的事情“少管”,结果养成了孩子唯利是图的性格,最后受到报应的是自己,这种例子实在是太多了。这几近于一个道德怪圈:首先是绝对权威的退出,导致了天道消遁、社会公德失去了最终的保障;然后是腐败泛滥,官员无德,民众效之,“上梁不正下梁歪”,扩展至全民腐败;继而是人心不古,诚信无存,到处都是陷阱,整个社会陷入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并影响到家庭。儒家伦理的鼓吹者们所抓住的只是最后一个环节即家庭伦理、亲情孝道,以为只要恢复了这个环节,其他一切自然会好起来,他们把结果当成了原因,而他们的说教由于脱离实际,只能走向伪善。

当然,我这样说,决不是像“新权威主义”或“乌有之乡”那样主张重新拥戴一个绝对权威,那是一种没有出路的设想,在今天也是一种绝不可能的幻想。我说中国人当今需要的是一个权威,这只是一种国情诊断,它是基于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内部结构的剖析而得出的结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性和惯性使我们至今仍然只能采取这样一种没有出路的思维方式。因此,什么时候中国人不需要一个绝对权威而能够在道德上真正自律了,什么时候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才有希望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就目前而言,这种道德自律的建立看来还只能从西方文化中找寻,这也就是将五四以来的启蒙加以进一步深化,这才是走出中国当代道德怪圈的唯一出路。所以从中国社会未来的现实发展看,中国人又不需要、也不再可能有任何如同皇权那样的绝对权威,凡是鼓吹强加给中国人一种绝对权威的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对当今时代的趋势置若罔闻或完全没有了解。

最近,武汉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奇书,叫作《儒家伦理新批判之批判》,是针对我有关儒家伦理的新批判主义观点而组织拼凑起来的一本论文集,全书66万字,参与者共24位,其中不乏近年来国内鼓吹儒学复兴的学界名流。发动这样规模的针对单个人的围剿,自从批胡适、批胡风 and 批刘少奇以来,久违了。这种现象充分说明,在中国,哪怕在知识界,内心自觉不自觉地保持着整

人思维模式和“文革情结”的大有人在。幸好他们现在手中并无实权，遥想当年孔子摄鲁相七日而诛杀少正卯，^①真是令人不寒而栗。试想，以这些人所鼓吹的儒家伦理来占领中国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趁本书再版之机，发了一通最近所想到的议论，虽然杂乱，却也透露出我本人每日耿耿于怀的一个想法，就是：启蒙的使命任重而道远，有志于此的同道们，大家努力啊！

又及：这次再版在文章篇目上有所调整，即删除了《〈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导言》和《世纪末文学的灵魂》（后者原为《灵魂之旅》的导言），增加了《〈于天上看见深渊〉跋》和《发人深思的互补——读潘能贝格的〈神学与哲学〉》；另外将《我被错划为“右派崽子”的经历》一文的标题改为《一个“右派崽子”的“革命”经历》。

邓晓芒

2011年11月9日

①现在儒生们极力否认这件事曾经发生过，其实这种辩解毫无意义。因为即使历史上不曾发生过此事，但荀子所列少正卯该系的五大罪证（所谓五恶：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毕竟由儒家开了中国文字狱的先河，后世文字狱（直到“文革”）都是按照这些标准来惩治不同意见者的。

自序

上小学的时候,我常常对满天闪烁的星星感到好奇和困惑,那时的志向是当一个科学家,特别是天文学家。到了初中,我迷上了美术,对线条、形体和人物的表情感兴趣,记得曾在班上随手画了许多张漫画小人头像,全班同学纷纷来讨要,每人一张,没有相同的。初中毕业后下到了农村,下放的第一天就和两个最要好的知青朋友去小河边,给他们每人画了一张很像的肖像速写。这两张速写一直保存了好多年,后来不知弄到哪里去了。在乡下,我的爱好是知青中普遍流行的看外国小说,什么《斯巴达克斯》《牛虻》《怎么办》《约翰·克利斯朵夫》《大卫·科波菲尔》《堂·吉珂德》《高老头》《死魂灵》《毁灭》《士敏土》《静静的顿河》《复活》……当时每传来一本,大家都是没日没夜地看,力争在规定时间内还给物主,或交给其他排队等候的人,看完后时常还热烈地讨论。音乐方面我没有什么天赋,顶多能做到把最普通的音咬准而已,但也很乐于加入几个人即兴的合唱之中,为和声的震人心魄的魔力而陶醉和兴奋。下乡第五年时转向了哲学,开始是强迫性的,为了提高自己、解决思想问题,后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般的哲学通俗读物不过瘾了,就看黑格尔、看康德。但我对文学和美术的爱好始终没有放弃。1974年病退回城后,我在土方队挖地基、修马路,只要看到上好的纯净白胶泥,就带一书包回来,下雨天就在家自己做雕塑。有一段时间经常去附近的湖南师范学院美术系,混在那些工农兵学员里画石膏像和人物头像,还结识了一位很不错的高材生老曲,山东汉子。我常想,现在的青少年真可怜,从小就被固定在一个方向上做枯燥的训练,一点课余时间都被电视和电脑游戏搅得一塌糊涂,很少有主动去为自己的兴趣发展设计一个方向的机会。我有时还发现,不少孩子自己都认为他们是不

幸的一代,还不如我们那时可以没有顾忌地自己发展自己。

但是,近十几年来,我已放弃了所有的爱好。美术是早就不搞了,看小说也只是偶尔为之,有时甚至是为了写评论才去看某一本小说。曾有人问我有什么业余爱好,我说没有;他说是否有兴趣旅游,我说我现在是到书中去作世界性的旅游。实际上,我依旧保持了很广泛的兴趣,只不过这种兴趣通常是以思想的方式表现出来。我的美术兴趣表现在对美学问题的关注中,对文学的兴趣表现在对文学中的思想内涵的探讨中,对科学的兴趣表现在对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中,对政治的兴趣表现在对文化问题的深入中,对人的兴趣表现在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中。所以就此而言,我其实并没有放弃任何爱好,只是这些爱好都转为思想的爱好了。我把一切有点意思的东西、引人注目的东西,都看成是思想。我把与人的交往都看作思想的交往。因此,回顾这二十多年,我都在思想的密林中徜徉,时而穿行于林间小路,时而驻足于林中空地,时而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时而拉开距离对它们作整体的欣赏。周围有的是巨大的乔木,那通常都意味着哲学史上一位重量级的哲学泰斗,有的则是刚出土的幼苗和一岁一枯荣的小草,它们虽然不见得能在历史上留下经久不衰的影响,但也体现了一个时代思想界的盎然生机,未来的思想巨人说不定就产生于其中。这种徜徉,在外人看来有点不食人间烟火,毕竟,有多少人愿意到思想的密林中去“隐居”呢?但就我本人来说,我觉得我的一切思考都是与这个人间的世界有密切关系的。我历来把抽象高深的哲学看作是一门最“现实”的学问,它就是我们这个每天发生着无数令人欣喜、令人烦恼、令人惊叹、令人恐怖和令人愤怒的事件的世俗生活的集中表达。只不过,因为觉得就世俗生活的具体问题来谈论这些问题将永远也谈不清楚,我才转向了能够从根本处搞清问题的哲学。当然,哲学本身的问题也不是能够轻易搞清楚的,但这并不是我不研究哲学的借口,反而激起我更大的好奇心和思想动力,想要作创造性的开拓——这与我儿时仰望星空所引发的那种冲动是同一种东西。

然而,我在进行极其抽象的哲学思考和概念辨析的同时,仍然坚信歌德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这些年来,我除了沉浸在自己

的专业领域,把大量时间花在翻译和著书立说上以外,还写下了不少思考人生、关注社会现实的文字。我力图把自己的哲学观点贯彻于对现实和现实中的人的解读中,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实验场所就是文学,其次就是中西文化比较。其实我的文学批评基本上也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入手的,文化批判是我所选取的一个用哲学介入现实的切入点。迄今为止,我已出版的文学评论和文化比较(文化批判)的著作有六部(有三部是已发表的单篇论文的结集)。这些书已逐渐引起了读书界比较广泛的注意。这里所集结的文集应当算是第七部了,它们大部分是一些书评、序跋,还有一些随笔、回忆录和散文。所选书评和序跋虽然大都涉及学术性很强的专著和博士论文,但我长期以来为学术著作写书评和序已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就是必须借此把抽象的议论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所以辑入这本书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所选文字一定有与现实或历史、特别是与文化批判相关的内容,至于那些专业性强的内容分量不多,保留一点也有形成思想的张力的作用,一般读者当然也可以跳过去不读的。所以本文集大体上可以看作一本哲学随笔和文化随笔集。有的人对“哲学随笔”这一提法很反感,认为哲学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地写呢?其实如果不把随笔理解为随便动笔,而是理解为随兴命笔,则尼采、帕斯卡尔都可以看作哲学随笔的大师。我当然不敢与这些伟人相提并论,何况我自知我的长处并不在此,我真正感到得心应手的是进行概念的逻辑分析。但多年来的研究也留下了一些“学术副产品”,这就是这些接近于随笔的书评和序跋,等等,它们往往透露了枯燥的学术研究后面的真实的生活信息。如果读者通过阅读这些文字对我的哲学立场有更具体、更深入的理解,对于我来说就是求之不得的了。

邓晓芒

2004年7月于珞珈山

目 录

思想者与时代

- 3 我们时代的精神生活
- 12 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
- 21 思想中的学术与学术性的思想
- 26 网文与官文
- 29 关于大学体制改革的思考
- 36 文人之于平常心
- 38 “海德格尔学案”对中国学人的启示

思想的触角

- 51 读韦卓民先生西方哲学译著的文化断想
- 62 “角色意识”与“倡优意识”
——关于中西哲学的通信
- 78 涂尔干宗教学方法论的误区
- 82 发人深思的互补
——读潘能贝格的《神学与哲学》
- 91 哲命诗魂化典辞
——读《吹沙二集》有感
- 95 作为一种“训练”的偶在论

- 99 个人承担与悲剧意识
- 103 思想者的四种随笔性格
- 114 来自异域的毒眼
- 120 什么都不“是”，谁“在”？
- 125 沉重的超越
——评姚国华“文化立国”“大学重建”说
- 131 风云因何而起

由潜沉到开朗

- 137 《于天上看见深渊》跋
- 149 康德三大批判的中国旅行
- 155 青春的迷惘
- 158 大学生学刊寄语
- 160 田野的梦
——一品油画《秋季风景系列》
- 162 美与善的沉思
- 170 关于《从寻根到漂泊》
- 175 解《通天塔》之谜
- 183 合唱之魂
——读胡发云《死于合唱》

在崎岖小路上携手同行

- 191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后记
- 194 陈望衡《20 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序
- 198 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序
- 204 魏敦友《回返理性之源》序
- 208 谢劲松《爱智慧与爱的智慧》序
- 211 高秉江《胡塞尔与西方主体主义哲学》序

216	何卫平《通向解释学的辩证法之途》序
223	张廷国《重建经验世界》序
228	卿文光《论黑格尔的中国文化观》序
233	与大学生聊学术规范
236	教育的艺术原理

记忆中可珍贵的

251	一个“右派崽子”的“革命”经历
284	童年的书
287	故乡的坟
289	快乐的白杨
291	有限与无限
293	有颜色的梦
296	永恒的歌
301	白鹭
304	我们那个时代的“小资”
307	《永州旧事》序
312	我的恩师修斋先生

思想者与时代

我们时代的精神生活

常听人说,我们时代是一个“人文精神失落”的时代,即一个没有精神生活的时代。的确,在一定意义上,这是无法否认的现实。不论我们从前是否曾经拥有过丰富深厚的“人文精神”,或至少拥有某种虚假的“理想主义”,我们目前却是实实在在地“堕落”了。随着“马列主义老太太”那一代人离我们而去,我们在年轻一代身上再也难以看到精神或哪怕“伪精神”的痕迹,只有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更可悲的是,没有人能够教他们什么。在许多年轻人眼里,一切教育都成了陈词滥调,一切训导都成了权力的显示,一切“寓教于乐”或审美教育、情感教育都成了不值一晒的骗术。现代青年欣赏的是“酷”,即对一切都满不在乎,处处表现自己的独立性。

但这种“酷”其实是有条件的,它并不真正基于个人的思想深度和性格魅力,而是以一定的收入来源和生活水平为基础的,至少,这些少男少女们的青

| 徜徉在思想的密林里 |

春偶像们必须衣食无忧,否则怎么“酷”得起来?显然,为了“酷”和“扮酷”,年轻人向往着靠钻营和本事(钻营也是一种本事)升官发财,成为千万、亿万富翁,以便香车豪宅,美女如云,颐指气使,一掷千金。没有本事的则梦想着各种一夜暴富或一夜成名的机会,包括中彩、傍大款、传销、赌博以及各种不法的谋利。当然,最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是一些幸运儿,靠天生优势(美貌、歌喉或体魄)在歌坛、影坛、模坛、体坛上大展身手,他(她)们才真正最有资格“扮酷”。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在成年人看来十分肤浅甚至幼稚可笑的青春偶像们会得到如此大群少男少女们狂热地崇拜和追捧了。他(她)们崇拜的,其实并不是那些拙劣的演技、球技、嘶哑的嗓门和贫血的歌词,而是自己心中近在咫尺的幻想。这是一个没有英雄也不需要英雄的时代,任何人都可以视任何人为“彼可取而代之!”,似乎一切都取决于机遇和运气。这是一个“精神动物的王国”。

当然,我们也不必过分责怪当代青年的低俗、浅薄和麻木,他们其实表达了现实生活的原生态。当以往那些空洞的豪言壮语和大言不惭都烟消云散之后,这种原生态就以毫无顾忌的赤裸裸的形式展现出来,并带上了这一代年轻的生命力及其与“文革”红卫兵的狂热相比丝毫不逊色的劲道。平心而论,我们宁可青年们崇拜港台歌星而不愿他们崇拜政治“大救星”,宁可他们无病呻吟而不希望看到他们有病的“朝气蓬勃”“天天向上”。没有理由指责当代青年缺乏理想和精神追求,因为这种可追求的理想和精神生活在当代中国还有待于创立。可以预想,这种创立与过去的伪“人文精神”的一个最根本的不同之处恰好应当在于,新人文精神不是排斥、取消和否定世俗生活的,而是从世俗生活中提升出来的,不是抹杀个人兴趣和爱好的(不管这种兴趣爱好多么低俗),而是保护、发展和提高个人素质的。然而,就是这个最根本的不同,在今天宣扬恢复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那些知识分子们的思想中得不到认同。几千年的思维惯性使他们本能地认为,一谈“人文精神”就必然要向世俗生活开刀,必然是“存天理,灭人欲”,必然是“言义不言利”“熊掌与鱼不可兼得”,甚至不惜借用西方基督教禁欲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来“提升”中国人的思想境界。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无疾而终的原因。这场讨论注